

范仲淹军事思想探析

刘春霞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系, 广东 广州 510091)

摘 要: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其文集中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 与宋廷积弱、战争屡败的情况下文人儒士普遍关注兵学问题的土风有关, 也与其经略边防的实践经验密不可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 关于改革朝廷军事政策的观点; 反对冒然兴兵、主张以“和”、“守”为主的边防政策。

关键词: 范仲淹; 军事思想; 朝廷军事政策; 边防政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0092 (2011) 01 - 0058 - 04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同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西夏李元昊反宋称帝时, 范仲淹以一介文臣经略西北边地数年。其间, 范仲淹结合其守边经验, 对改革朝廷军事政策、如何处理宋夏关系等问题, 提出了一系列见解, 体现出一定的军事远见。本文着重探讨范仲淹军事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关于改革朝廷军事政策的观点

宋朝有惩于五代藩镇割据之弊, 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这虽然使宋朝文化达到空前繁荣, 但也带来了将弱兵疲的弊端, 致使宋朝的军事力量日趋衰弱。范仲淹在警戒西夏、经略边地的过程中, 对朝廷的军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 这亦是其政治改革主张的重要内容。

第一, 范仲淹主张重用武将、严饬武备。宋初统治者采取偃武兴文的政策, 严防武将专权, 废弛武备。宋太祖称: “五代方镇残虐, 民受其祸, 今用儒臣干事者, 百余人, 分治大藩, 纵有贪浊, 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1]293} 这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 一直被沿袭下来。范仲淹引用五代历史与本朝现状进行比较: “五代衰乱, 专上武力, 诸侯握兵, 外重内轻, 血肉生灵, 王室如缀, 此武之弊也。”而“皇朝罢节侯, 署文吏, 以大救其弊, 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 忘战日久, 内外武帅, 无复以方略为言……一旦戎狄叛常, 爰及征讨, 朝廷渴用将帅, 大患乏人, 此文之弊也。”^{[2]256} 五代藩镇权重, 朝廷不能统制,

是重武轻文之弊; 本朝太祖时以文臣节制武帅, 故无藩镇之祸, 但天下承平日久, 将不知兵, 兵不习战, 一有战事则将帅乏人, 这又是重文轻武带来的严重后果。范仲淹主张权衡文武, 二者不可偏废。

范仲淹认为文事、武备之“体”是一样的, 都是使国家归于治理的根本, 只是其“用”不同: “文武之道一, 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 定祸乱, 同归于治者也。”^{[2]256} 范仲淹还针对朝廷以儒立国、主张以仁义宾服天下的政策, 指出孔子也不主张废弛武备: “圣人之有天下也, 文经之, 武纬之。此二道者, 天下之大柄也。昔诸侯暴武之时, 孔子曰: ‘俎豆之事, 则尝闻之。’此圣人教之以文也。及夹谷之会, 孔子则曰: ‘有文事者, 必有武备, 请设左右司马。’此圣人济之以武也。文武之道, 相济而行, 不可斯须而去焉。”^{[2]200} 认为“先王修德, 以服远人, 然安不忘危, 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2]454}, 应把德治与武力结合起来, 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第二, 范仲淹要求朝廷开启兵禁, 责令文武大臣讲习兵书。宋太祖立国之初, 禁止文武大臣讲习兵书。至仁宗时期“孙吴之书, 禁而弗学”。范仲淹援引秦朝灭亡的例子, 说明士人习读兵书与国家祸乱无必然联系: “秦之焚书也, 将以愚其生人, 长保天下; 及其败也, 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针对当前士人不读兵书、骄侈淫逸的现象提出批评: “况前代名将, 皆洞达天人, 嗣续忠孝, 将门出将, 史有言焉。今将家子弟,

收稿日期: 2010-05-26

作者简介: 刘春霞, 女, 湖南澧县人,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化研究。

蔑闻韬铃，无所用心，骄奢而已。文有武备，此能备乎！”范仲淹主张授以边防将士兵学谋略，令其讲习研读。“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2]222}。“于将佐及使臣军员中，拣选识文字、有机智武勇、久远可以为将者，取三五人，令经略、部署司参谋官员等密与讲说兵书，讨论胜策。所贵边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将略。”^{[2]553}并将边防将略与军事实践结合起来，使将士不仅知兵晓战，具有勇武谋略，而且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2]222}范仲淹曾劝导著名大将狄青读兵书。《宋史·狄青传》记载：“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材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3]9718}可见范仲淹在培养将才时非常重视其兵学修养。

第三，范仲淹提出边防大臣应文武兼用。宋廷为防止武将专权，采用以文制武的将兵策略。军队平时由武将统领训练，战时则由朝廷临时委派大臣兼任军队首领，称之为“帅臣”^[4]。由于这些“帅臣”平时高居庙堂，并不了解边地形势与军队情况，战时用兵往往造成上情下壅，将帅不和，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康、庆年间，宋廷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即是明证。庆历二年（1042）朝廷诏命复置秦凤、泾原、鄜延、环庆四路都部署，由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领之，系衔并带四路招讨使。范仲淹上书时相吕夷简，提出陕西四路应两路用文臣，两路用武臣，“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体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2]257}，使文武协同作战。范仲淹还主动提出辞掉边防大帅之职，以待武臣。

不过，范仲淹虽然提出参用文武大臣防边，但并不主张无限提高武臣的职权，反而极力维护宋廷“以文抑武”的基本军事政策。范仲淹认为以“文帅”节制武将的制度是“朝廷之大体”，而“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是用内朝近臣，出临戎阃，以节制诸将”，武臣则会“以朝廷之势，而望风稟律”，才不会形成边将武臣骄亢之祸^{[2]401}。范仲淹赞成厚禄待武将的作法，称“祖宗朝任用边将，赏赐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杀在己。惟惜官职，不令满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实前王驭将之术也”^{[2]568}。宋太祖以武力夺取后周政权，深知武将专权对于朝廷的严重威胁，故采取以文人儒士治国的方针，尽

收武将兵权，以宽大柔厚养士，所谓“厚其禄而薄其礼”（《官门·张演论官制》）^[5]，使武将位轻权轻，不至于形成擅权乱国之祸。范仲淹基于一定的军事实践经验，对“以文制武”之制的弊端有一定认识，但仍然不能突破宋朝文官集团在祖宗家法之下形成的普遍观点。

第四，范仲淹提出复兴武举。武举始设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唐代武举产生了一批将帅之才^[6]。著名将领郭子仪即是武举出身。武举在唐代设置，但五代至宋初废弃不置。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宜复唐之武举”^{[2]202}，天圣五年（1027）在给宰执大臣的上书中又提出“宜设武举，以收其遗”^{[2]222}。在范仲淹、苏绅等大臣的反复奏请下，仁宗于“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寢息，遂废此科。”^[7]从天圣七年设置，至皇祐元年废置，在宋夏战争期间，武举在选任边防将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补充了武臣武将的来源。

第五，主张改变武将的升迁磨勘之法，缩短时限以劝诱边功。对文武之转迁，范仲淹认为，应改变朝廷“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的“磨勘”法，不能仅以年限升迁，而应责求实效。对于边防武职大臣的“磨勘”期限，范仲淹提出应变五年为三年，范仲淹称：“陕西、河东沿边州军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监、巡检、寨主、监押等，自来与诸处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劳逸不均，又迁转无别。是故各图优稳，不就边任，以此将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战守之地，责其死节，苟循常规，将何以劝？”^{[2]606}所以应缩短武臣升迁年限，以劝诱边功。

范仲淹关于朝廷军事政策的观点，都是针对宋朝政策之弊提出的。他主张重用武将、严饬武备，开启兵禁、督讲兵书，恢复武举、提升武将地位等措施，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是对宋初以来重文轻武国策的反拨。

二、反对冒然兴兵，主张以“和”、“守”为主的边防政策

宋朝立国之初就处于严重的边患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来于北部的契丹与西部的党夏。宋真宗“澶渊之盟”与辽讲和之后，宋朝边患则集中在西部。西夏李元昊于宝元元年（1138）自行称帝后，宋廷力图征服西夏，西夏则力图摆脱对宋廷的臣服。这使宋与西夏战争不断，而宋廷则屡屡败北。在西夏称帝、群情鼎沸的情况下，范仲淹反对贸然兴兵伐夏，提出了以“和”、“守”为主的边防政策。

首先，范仲淹反对“怒而兴兵”。西夏李元昊自行称帝，在宋人看来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范仲淹称“昨者西戎僭中朝之号，四海愤怒。虽困天下，义当讨伐。”^{[2]251}《词源》释“僭”道：“越分，指超越身份，冒用在上者的职权行事”。但在李元昊反宋、朝野讨伐呼声高涨的情况下，范仲淹反对贸然对西夏用兵，称“大凡胜则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并引孙武语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2]767}不可乘怒而战，应该在冷静思考、全盘筹划的基础上兴兵作战。范仲淹对其原因作了详细深刻的分析。

第一，认为宋朝将不知兵、士不习战，军事力量薄弱，不宜战争。范仲淹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即指出：“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2]200}指出了宋朝承平日久，人不识兵，将士习安，边防松弛的现状。范仲淹在经略陕西时分析当时延州的防守情况道：“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2]255}宋廷自“澶渊之盟”后，君臣以为天下从此太平，遂废弛武备，致使国人不识兵革，将士只知盲目守边，并不知道为何而战、如何去战，宋朝军备之弱自不待言，在这样的形势下，宋廷是无力兴兵战争的。

第二，就外部条件而言，认为宋廷主动伐夏利于夏而不利於宋。这是范仲淹分析宋、夏所处的外部战争环境特征得出的结论。认为西夏“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而宋军“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廩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2]162}“今之守边，多非士兵，不乐久戍；又无营田，必烦远馈。久戍则军情以殆，远馈则民力将竭。”^{[2]259}与西夏惯于边防掠夺、无需巨大的养兵之费不同，宋军远戍，粮草军饷须必有千里馈输之劳，加上宋廷将士长期离乡远戍，军情怨愤，必然削弱兵力。范仲淹指出，即使宋军得其将帅，精练士卒，依靠边地险恶的环境，坐壁清野以待敌，或侥幸有所斩获，但敌败逃散，不几日“复旧汉疆”；如不能破敌，宋军深入追击敌人于大漠中，亦不能有所得，况且常遇风雨天气，宋兵赢粮远涉，粮尽路穷之

际，“不敌自困”^{[2]255}。范仲淹还引用太宗朝的战争实例进一步阐释道：“太宗朝以宿将精兵北伐西讨，艰难岁月，终未收复。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引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岁久，中原无宿将精兵”^{[2]521}。宋夏决战于绝漠险滩中，西夏军队能够充分发挥游牧民族军队之灵活轻捷的优势，动辄以轻骑挠搅宋军，败则逃散，胜则劫掠而去。宋廷步伍除了有舟车劳顿之苦、粮草军需之难、士卒远戍之怨外，退不能长期坚守，进不能驱战于荒漠，毫无优势可言。

其次，范仲淹主张“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2]587}，主张先与西夏约好，待做好充分战争准备后兴兵作战。

第一，范仲淹提出在当前武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只能与西夏采取“和”的策略。范仲淹引汉代孝文帝结和匈奴的事迹，说明应该与西夏讲和，以息民力，并指出“司马迁以文帝能和乐天下，协于大乐，故著于《律书》，为后代法”^{[2]163}，所以应效法汉文帝而与西夏讲和约好。范仲淹指出，如果现在乘愤与西夏战争，万一再次战败宋廷就失去与夏讲和的机会，“且兵马精劲，西戎之所长也；金帛丰富，中国之所有也。礼义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则当任其所有，胜其所长，此霸王之道也。”^{[2]720}如果朝廷应以一郡所产之绢帛纳与西夏，以求得一国之无战，是“息天下之弊”，有利于宋廷。

第二，范仲淹所提出的“守”、“和”，并不是消极防守，而是积极备战，以守为攻。范仲淹虽然赞同君王以德行、仁义宾服天下的政策，但他鉴于宋代几朝的历史教训，认为李元昊屡次请和，又屡次背盟出兵，所以讲和并不能一劳永逸，应该在边备不足、士卒未练、将帅不得其人的情况下，与西夏暂且约和；在休息民力的同时，发展武备，充实库禀，像唐太祖、太宗对待突厥一样，“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事。”^{[2]588}

第三，就以守为战的策略而言，范仲淹提出“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的观点。“土兵”即土著之兵；“东兵”即京师之兵。这是因为土兵“习山川道路之利，怀父母妻子之恋，无久戍之苦，无数易之弊。”而守之以“东兵”，必然有粮草辎重远输之劳，有土兵远戍之怨，“费厚则困于财，戍久则聚其怨。财重则难用，怨聚则难保。民力日穷，士心日离，他变之生，出于不测。”^{[2]718}与以土兵守边的观点一致，范仲淹提出了“屯田”养兵以守的政策。使兵寓于农，免除远馈粮草之劳，充实边境库禀。将兵士之家徙

于边境，免除兵士远戍怀乡之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羨，中糈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怀恋者，功相远矣。”^{[2]163} 范仲淹还重视利用蕃兵，“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2]726}。他认为蕃兵“皆能辛苦，熟于战斗。如抚馭之间，恩威得所，大可防托边界，减得兵马。”^{[2]601} “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四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2]590}

范仲淹从天时、地利、人和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宋廷不宜战争的现状，提出了以和、守备战的军事策略。这些观点都是范仲淹从边防实践中得来，论述深刻合理，不同于一般儒士从历代战争事例中分析成败得失的疏阔之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体现出范仲淹深厚的军事素养。

三、范仲淹军事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范仲淹并非兵学家，他是作为一介儒臣文官的面目出现在战争舞台上的。《宋史》本传称“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3]10267} 在北宋中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密切关注朝廷军事问题。他结合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对朝廷军事政策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意见，对如何应对西夏侵略、戍守边防提出了具体的战争策略。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宋廷积弱、战争屡败的情况下，文人儒士普遍关注兵学问题的士风有关，也与范仲淹经略边防的实践经验密不可分。

首先，与北宋中期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士林中兴起的谈兵风尚有关。在宋太祖偃武兴文的政策下，宋朝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士风，文人普遍以言兵为耻，以执兵戈为耻。至真宗时幽州败北，朝廷更是“恶言兵矣。”^{[3]172} 至仁宗时，这种讳言谈兵的风气依然尚浓。张方平《送古卜北游序》称：“国家用文德怀远，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纪，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战，公卿士人耻言兵事。”^[4] 赵抃《奏疏论契丹遣使无名》一文记载道：“顷岁西师未兴之日，士大夫有横议及此者，人皆窃笑鄙易之，指为狂狷不祥之言。”^[5] 西夏反宋、宋廷屡败后，宋廷开始认识到西夏兵力强大、难于征服的现实，也认识到了自身军事力量之弱。在这种形势下，宋廷兵禁始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道：“仁宗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方兵矣。”^[6] 苏舜钦在《论西事状》一文中亦称：“自西寇逆节，天下言兵者不

可胜计。”^[11] 兵禁大开，带来的是文人士大夫谈兵论战风尚的兴起。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是仁宗开启兵禁后士人群体中谈兵之风勃兴的表现。而范仲淹慷慨激昂、纵论天下政治、军事的气概，反过来也对当时的士风有一定的劝诱作用，《宋史》本传称范仲淹“每感激励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3]10268}

其次，范仲淹丰富的军事思想与其经略边防的实践经验分不开。西夏称帝侵宋之际，范仲淹由贬所被起用，正如其自称：“国家以西陲搔动之际，起臣贬所，特加奖用。”^{[2]394} 康定元年（1040）三月，朝廷应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请，起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未至永兴，又改为陕西都转运使。七月，擢刑部员外郎、陕西都漕，又迁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一起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再迁户部郎中，自请代张存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经略边地的军事实践。范仲淹经略陕西卓有成效，尤其是建立将兵法，改变了宋太祖以来“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情况。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先是，诏分边兵部署领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有寇则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贼众而出战，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为分州兵为六将，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贼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盖指雍云。”^{[13]3036} 范仲淹以一介文人将兵，其军事才能让西夏闻风丧胆，成为与范雍并称的“大小范”。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在当时就受到别人的认可与推崇。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称范仲淹“文武兼备”^[12]；黄庭坚在《跋道服赞》一文中称其为“当时文武第一人”^{[2]1045}。

在宋朝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谈兵论战是其重要表现。但当时众多文人多从研习古代战争事例中获得相关的兵学认识。如北宋中期文人张方平好谈兵事，他在一系列奏论、策对中对朝廷军事政策提出见解，但他所谈兵学理论，多从研习兵学史著中所得，正如其所称，其“不达兵事，今所论着，皆参校前史旧迹得失之状，可施于世者”（《刍荛论·武备论》），“徒采历代史册兵谋、地志，及所见朝廷施为显然之事，臆度道听”（《平戎十策·表》）。苏洵亦喜好谈兵，但主要从历代成败得失角度来论述，很少与现实相联系，遭到南宋思想家、军事家叶适的讥刺：“《权书》、《衡论》几策，多谈兵，论为将，草（下转第65页）

世情，长短不拘，轻重不计，风格与史传有着截然的不同：尖锐、明快、潇洒、热烈，杂以幽默，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作家蒲松龄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平生感慨，寄至于笔端。这种艺术形式给了作家极大的抒写自由和便利，不但可以评价作品中的人和事，还可以由此及彼，借题发挥，直接地抨击社会上的种种丑恶，从而构成了这部名著在艺术内容方面值得珍视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 夏春豪.《聊斋志异》“异史氏曰”略论[J].青海师专学报, 2002, 22 (4): 19.
- [2] 许天琪.“异史氏曰”漫评——聊斋论稿之一章[J].蒲松龄研究, 1995 (1): 58.
-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一卷本)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46.
- [4] 郑铁生.《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形式的探析[J].蒲松龄研究, 2001 (4): 41.

Study on the Artistic Sentence “Yishishi said that…” in “The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LI Junfe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Jinan 250014,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is a great success among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in China. “Yishishi said that…” , put at the end of each tale , interprets and extends the tal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ales to a great extent.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rtistic charm of “Yishishi said that…” : expressing the true feelings of the author ; bringing out the crucial point ; serving the contents of tales.

Keywords :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 Yishishi said that… ; artistic charm

(上接第 61 页)

野未除。”^[13]但范仲淹对朝廷军事政策的相关观点，都是从其经略边防的实践经验中提炼而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总之，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其文集包含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在宋廷偃武兴文、国势危急的形势下，范仲淹结合其多年经略边防的军事实践，对改革朝廷军事制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就如何应对当时的主要敌人西夏提出了一系列军事主张与防边策略，体现出了深厚的军事素养。范仲淹军事思想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北宋中期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士林谈兵风尚之兴有关，与范仲淹多年的防边实践有关，也是文治背景下文人士大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2002.
- [3]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 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J].中州学刊, 1984 (2): 107-111.
- [5]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 21[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7-32.
- [6] 刘琴丽.从出土墓志看唐代的武贡举[J].中国史研究, 2003(3).
- [7] 王栎.燕翼贻谋录[M].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44.
- [8] 张方平.乐全集[M]//全宋文：第 38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6.
- [9] 赵抃.清献集[M]//全宋文：第 41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50.
- [10]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64.
- [11] 苏舜钦.苏舜钦集[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2：155.
- [12] 韩琦.安阳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徐正英，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724.
- [13]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743.

The Study on Fan Zhongyan's Military Thinking

LIU Chunxia

(Department of Art- Law, Guangdong Radio- TV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9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 Fan Zhongyan was the famous statesman , literati and strategist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 and his articles contained plenty of military thinking. Fan Zhongyan's military thinking emerged and developed in the background that Confucian scholar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military matters commonly when Song was weak in national defense and defeated for many times by East Xi and Liao. Fan Zhongyan's military thinking also due to his frontier defense experience. Fan Zhongyan's military thinking comprised the opinion of reforming the nation's military policy , his opposition fighting without ample preparation , his suggestion resort to peaceful policy in the war.

Keywords : Fan Zhongyan ; military thinking ; nation's military policy ; frontier defense policy